

The Long Road to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e European Economy in a Global Perspective, 1000—1800

# 通往工业革命的漫长道路

全球视野下的欧洲经济，1000—1800年

[荷] 扬·卢滕·范赞登 著

隋福民 译



The Long Road to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e European Economy in a Global Perspective, 1000—1800*

# 通往工业革命的漫长道路

全球视野下的欧洲经济，1000—1800年

[荷] 扬·卢滕·范赞登 著

隋福民 译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通往工业革命的漫长道路：全球视野下的欧洲经济，  
1000—1800年/（荷）范赞登著；隋福民译。—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1

书名原文：The Long Road to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e European Economy in a Global  
Perspective, 1000—1800

ISBN 978-7-308-15524-3

I.①通… II.①范… ②隋… III.①欧洲经济—经  
济史—1000~1800 IV.①F15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00406号

通往工业革命的漫长道路：全球视野下的欧洲经济，1000—1800年  
[荷]扬·卢滕·范赞登著 隋福民译

---

责任编辑 王志毅

文字编辑 王军

责任校对 周元君

装帧设计 王小阳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148号 邮政编码310007)

(网址：<http://www.zjupress.com>)

制作 北京大观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印刷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635mm×965mm 1/16

印张 28

字数 338千

版印次 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308-15524-3

定价 65.00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中心联系方式：(0571) 88925591；<http://zjdxcbbs.tmall.com>

## 通往工业革命的漫长道路

社会经济史译丛

学术委员会

学术委员会主席

李伯重 清华大学教授，香港科技大学讲席教授

学术委员会委员（按姓氏音序排列）

包弼德 (Peter Bol) 哈佛大学讲席教授

包乐史 (Leonard Blussé) 莱顿大学讲席教授

包伟民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陈春声 中山大学教授

陈争平 清华大学教授

陈志武 耶鲁大学教授，清华大学特聘教授

何明 云南大学教授

刘宏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授

刘兰兮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

马德斌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上海财经大学特聘教授

韦森 复旦大学教授

吴松弟 复旦大学教授

萧国亮 北京大学教授

张国刚 清华大学教授

周绍明 (Joseph McDermott) 剑桥大学教授

主 编

龙登高 清华大学教授



启真馆出品

## 总序

就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而言，中文与外文（主要为英文）学术圈各自相对独立，尽管现在信息交流与人员往来已经较为频繁，两个学术圈有所交叉，但主体部分仍是明显分离的。相互之间对彼此的学术动态可能有所了解，但知之不详，如蜻蜓点水，缺乏实质性的深度交流，中外学者在这方面都颇有感触。而西方世界的社会经济史研究，相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在中国学术界的影响更为有限。关于海外中国研究、外国人视野下的中国历史、制度经济学等，由于相关译丛的努力，越来越多地被引入中国学术界。由于欧美、日本及其他地区的经济史、社会史等研究日趋成熟，其前沿性成果更需要我们及时获知，以把握当前社会经济史的学术动态和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对研究中国产生了兴趣，一则因为中国经济的崛起，一则因为如果不了解占人类五分之一人口的国度的历史，就不可能真正了解人类发展，他们希望与中国学术界有更多的交流。

就有关中国的史料与数据而言，中国学者对英文的原始史料涉猎有所局限，遑论荷兰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法文等，这些语种中有关华人与中国的记载，是在中文正史与野史中几乎看不到的世界。而这些史料，在中西方的比较研究，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等领域，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有待开发的史料还有域外汉文文献资料，包括朝鲜半岛、越南、日本等地的汉文古籍，以及东南亚、美国等地华人的文献与文物。仅从这个角度而言，引介和翻译海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也日益显得重要。就学科而言，由于专门化人才培养与学术研究的日益深入，各学科形成自身的特定概念、范畴、话语体系、研究工具与方法、思维方式及研究领域，对此但凡缺乏深入而全面的把握，相关研究就很难进入该学科体系，而其成果也难以获得该学科研究人员的认可。而专业人才培养、评审与机构设置等制度更强化了这种趋势。专门研究是如此精深，以致许多学者无暇顾及与其他学科与研究领域，见树木而不见森林，学术视野因此受到局限，甚至出现学科歧视与偏见，人类追求知识的整体感与宏观认识的需求亦得不到满足。

同时，不同学科的一些特定话语和方法，其实许多是可以相通的，学术壁垒并非如想像中的不可逾越的鸿沟。一旦打通障碍，架起沟通的桥梁，游走于不同学科之间，其收获有时是令人惊喜的，原创性的成果也常在跨学科的交叉中产生。如从历史源头与资料中原创出经济学理论，或以经济学方法与工具研究历史问题获得新思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希克斯、弗里德曼、哈耶克、库兹涅茨及为人熟知的诺斯、福格尔等，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因此，“社会经济史译丛”的宗旨与取向为：第一，在学科上并不画地为牢局限于经济史和社会史，也将选择与之相关的思想史、文化史，或以历史为取向的经济学与社会学研究成果，更欢迎跨学

科的探索性成果。第二，在研究地域和领域的选择上，将不局限于译者、读者、编者和市场自然倾斜的中国社会经济史，本丛书将力推西方社会经济史的前沿成果。第三，译丛除一般性论述的著作外，也接受史料编著，还精选纯理论与方法的成果。在成果形式方面，既选择英文著作，也接受作者编辑的论文集，甚至从作者自己的英文论著中翻译或加工创作的中文成果。在著作语种的选择上，除英文作品外，还特别扶持其他语言论著的中译工作。

我们希望本译丛成为跨越和沟通不同语种成果、不同文化、不同地域、不同学科与中外学术圈的桥梁。

龙登高

2009年5月于清华园



## 中文版序

范赞登 (Jan Luiten van Zanden) 教授是国际著名的经济史学家。他 1981 年毕业于荷兰自由大学 (the Free University, Amsterdam), 1985 在瓦格宁根农业大学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of Wageningen) 获得博士学位。此后先在伊拉斯谟大学 (Erasmus University, Rotterdam) 和自由大学任教, 1992 年移帐乌得勒支大学 (University of Utrecht), 直至今日。他自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经济史研究, 至今已有三十余年, 在欧洲经济史研究方面成果斐然, 先后出版了 *The Strictures of Inheritance: The Dutch Econom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Dutch GNP and its Components, 1800—1913* 等专著 (合著) 以及 “Rich and Poor befor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 comparison between Java and the Netherland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19th century”、“On the efficiency of markets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s. Rice prices and capital markets in 19th century Java” 等具有重要影响的论文。由于其成就, 他于 1997 年当选为荷兰皇家科学

院院士，2003年荣获荷兰全国的最高科研奖——荷兰科学研究组织（Netherlands Organisation for Scientific Research）颁发的斯宾诺莎奖（the Spinoza premium）。他还于2009—2012年担任国际经济史学会（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History Association）会长。

范赞登在经济史研究方面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其中最著者，是他创造性地使用国民账户核算系统（SNA）方法对历史上的GDP进行的研究。在西方学界，研究近代以前的GDP并不始于他。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世界经济千年史》（*The World Economy: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就是一部综合了众多学者在这方面研究成果的著作，他对中国历史上的GDP的研究成果《中国的长期经济表现，960—2030年》（*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 960—2030*）也是开拓性的成果。但是就深入的区域研究而言，做得最出色的当数范赞登及其领导的研究团队。他们使用国民账户核算系统（SNA）的方法，对近代早期荷兰的GDP进行了开拓性的和深入的研究<sup>〔1〕</sup>。他们的研究代表了国际学界在此领域中的最新进展，为其他国家的学者研究近代早期的GDP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在取得这些成就的同时，范赞登并没有把自己的眼光限制在这个非常专门的经济史研究领域。在进行这种研究的同时，他时时关注更大的历史进程，力图更全面地去理解历史和解释历史。

经济史不是历史的全部。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早已指出：经济史“只是通史的一部分，只是为了说明而把它从其余的

---

〔1〕 其主要成果见：Jan Luiten van Zanden, “Taking the measure of the early modern economy: historical national accounts for Holland in 1510/14”, in *European Review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6, 2002, pp. 131–163; Jan-Pieter Smits, Edwin Holings & Jan Luiten van Zanden, *Dutch GNP and its Components, 1800—1913*, Groningen Growth and Development Centre, Monograph Series 5, 2000。

部分分离出来”<sup>[2]</sup>。同时，研究经济史的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索洛（Robert Solow）对西方一些只是简单地使用经济学方法来研究经济史的做法做了强烈的批评：当代经济学脱离历史和实际，埋头制造模型；而当代经济史也像经济学那样，“同样讲整合，同样讲回归，同样用时间变量代替思考”，而不是从社会制度、文化习俗和心态上给经济学提供更广阔的视野。因此“经济学没有从经济史那里学到什么，经济史从经济学那里得到的和被经济学损害的一样多”。经济史学家可以利用经济学家提供的工具，但不要回敬经济学家“同样的一碗粥”<sup>[3]</sup>。除此之外，全面和深入地了解经济史还面临一个更大的问题。以往在西方中心论的支配下，西方经济史学界把研究重点放在西欧经济的历史变化上。而对西欧经济史在近代早期从传统向近代转变的研究，又主要以英国经验为基础。这种以英国经验为基础的经济转型的“西欧模式”，被认为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意义。近年来，这种公认的普遍意义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与批评。因此如何正确对待“西欧经验”，成为晚近兴起的“全球史”所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

面对上述挑战，经济史学者应当如何办呢？首先，要改变上面这些情况，谈何容易！多年前，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为该组织出版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主要趋势》撰写了历史学卷<sup>[4]</sup>，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各国史学发展状况进行总结。在该书结语“当前的趋势和问题”中，他写道：“近十五至二十年来历史科学的进步是惊人的事实”，

[2] 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65页。

[3] Robert M. Solow, "Economic History and Economics", in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75, No. 2.

[4] 该卷后来以《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为题出版了中译本，见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1987年。

但是“根据记载，近来出版的百分之九十的历史著作，无论从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还是从概念体系来说，完全在沿袭着传统。像老牌发达国家的某些工业部门一样，历史学只满足于依靠继承下来的资本，继续使用陈旧的机器”。而造成这种状况的最重要的原因，则在于历史学家“根深蒂固的心理障碍”，即“历史学家不会心甘情愿地放弃他们的积习并且对他们工作的基本原理进行重新思考”<sup>[5]</sup>。因此，不是每位学者都能正视这些挑战并采取积极的措施，去解决这些挑战所提出的问题的。而在能够这样做的学者中，范赞登是一位佼佼者。

面对上述挑战，范赞登调整了自己的研究重点，研究地域从西欧（特别是荷兰）转向了全球，研究对象从经济扩大到政治、文化、社会，而研究方法也采用了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的方法。他在这方面做出的努力所产生的成果之一，就是本书——《通往工业革命的漫长道路：全球视野下的欧洲经济，1000—1800年》。

本书英文版于2009年由 Brill 出版社推出后，迅速引起学界的重视。之所以如此，一个原因是范赞登选择了工业革命的起因这样一个重大课题，作为本书研究的对象。工业革命被视为“把人类历史分开的分水岭”<sup>[6]</sup>。经过这个伟大变革，人类告别了以往传统的农业社会，进入新的工业社会。由于其在世界历史上具有这种“头等的重要性”<sup>[7]</sup>，因此对工业化的研究在世界历史研究中也理所当然地占有特殊地位。

---

[5]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327、330—332页。

[6] Douglas North,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81, p.158.

[7] L. S.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第276页。

为什么会发生工业革命？学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从工业革命发生起就已开始。在较早的研究中，工业革命被视为一个18世纪突然发生的历史现象。但到20世纪后期，此看法已逐渐被大多数经济史学家抛弃。现在比较普遍的观点是：工业革命并非一个局限于某一时期中的现象，而是一种持续的现象<sup>[8]</sup>，正如诺斯（Douglas North）所说：“工业革命并非与我们有时所认为的那种过去根本决裂；恰恰相反，它是以往一系列渐进性变化的积累。”<sup>[9]</sup>换言之，作为一个重大的历史现象，工业革命绝不可能突然出现。在欧洲，按照奇波拉（Carlo M. Cipolla）的看法，工业革命乃是18世纪以前700年来发生的历史变化的最后阶段<sup>[10]</sup>。而依照其他许多学者的看法，在这7个世纪中，欧洲已出现过一次甚至多次“工业革命”<sup>[11]</sup>。因此可以说在18世纪的工业革命以前很久，欧洲的经济已出现了重要的变化，在此基础上，18世纪的工业革命才有可能发生。

相对而言，在世界历史上，只有英国的工业革命主要是在“自己完成的经济循环”（笛福语）的基础上发生的，从而带有某种“自立性”的色彩<sup>[12]</sup>。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工业革命，或多或少地要受到先行者（特别是英国）的影响，甚至是法、德等国也不例

---

[8] 卡罗·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4卷，上册：《工业社会的兴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1页。

[9] Douglas North,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p.162.

[10] Carlo M. Cipolla, *Befor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European Society and Economy, 1000—1700*, New York & London: Routledge, 1993, p. xiii.

[11] 例如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认为西欧出现过三次“工业革命”：第一次发生于11—13世纪，最主要的地方是意大利；第二次发生于16—17世纪，主要在英国；第三次则发生于18世纪中叶以后，主要地点仍在英国。参阅布罗代尔：《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3卷，北京：三联书店，1993年，第630—644页。

[12] 参见大河入晓南：《英国的工业革命》，见周宪文编：《西洋经济史论集》，台北：台湾银行，1984年。

外<sup>[13]</sup>。至于更晚出现工业革命的国家或地区，受先行者的影响就更为巨大和明显。由于英国的这种特殊地位，其经验对于研究工业革命的起因当然具有无可比拟的意义。在过去两百多年中，学者们从近代早期英国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以及世界的变化（特别是殖民地的开发）等方面，找出了众多工业革命赖以出现的必要因素，并根据这些因素对工业革命的起因做出了多种解释。这些解释都认为：只有英国以及西欧（还有西欧的衍生物——北美）具备这些因素，因此工业革命必然发生在英国，之后只有西欧和北美可以迅速跟进，而其他地区则否。

然而，以往研究中得出的各种结论，仍然不能够完美地解释工业革命何以发生，以及工业革命为什么在西欧发生。之所以如此，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首先，以往工业革命研究中发现了各种导致工业革命的因素，然而彼此之间的关系到底如何？还是一个需要继续深入研究的问题。多年前，未来学家托夫勒（Alvin Toffle）在当时风靡一时的《第三次浪潮》一书中说：“任何对工业革命原因的探索都是徒劳的，因为它没有一个简单的和主要的原因。技术本身并不是推动历史的力量。意识形态或价值观念本身也不是。阶级斗争也不是。历史也不仅仅是生态变化、人口趋势统计或者交通工具发明创造的记录。单单用经济因素也不能说明这个或其他任何历史事件。这里没有超乎相互依赖的可变因素之上的其他‘独立的不变因素’。这里只有相互联结

---

[13] 在研究工业革命发生的特定条件时，法国经济史学家克劳德·福伦说：“法国不是这一革命的原发地，按照一个普遍发生于西欧的过程，工业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英国输入并向英国仿效的结果。”德国经济史学家克纳特·博查特也说：“不列颠的经济发展对德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前引卡洛·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4卷，上册：《工业社会的兴起》，第1章《1700—1914年法国的工业革命》（福伦执笔）和第2章《1700—1914年德国的工业革命》（博查特执笔），第2、66页。

的可变因素，其复杂性深不可测”<sup>[14]</sup>。事实上，这些“相互联结的可变因素”是怎么变化和怎样相互联结的，对工业革命起源的研究来说，可能与发现这些因素同样重要。

其次，以往对工业革命起因的研究，对象仅只限于英国和西欧。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工业革命确实起源于英国以及西欧。然而，正如巴勒克拉夫早就呼吁的那样，西方史学必须“重新定向”，必须尝试“采用更加广阔的世界史观点，跳出欧洲去，跳出西方去，将视线投射到所有的地区与所有的时代”。他强调：“史学家的观点愈富有世界性，愈能摆脱民族或地区的偏见，就愈接近获得有效于当代的历史观念。”<sup>[15]</sup> 晚近霍布森（John M. Hobson）更强调：“这种常见但却富有欺骗性的欧洲中心论，从各个方面来说都是错误的。至少可以说，东西方从公元 500 年开始就通过全球化一直联系在一起。”“东方的边缘化导致了一种高度的缄默，因为它掩盖了三个重要的事实。首先，东方在约公元 500 年后开拓了其自身的重大经济发展；其次，东方在公元 500 年后积极创造并维持着全球经济；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东方通过开创和向欧洲传播许多先进的‘资源组合’（如技术、制度和思想），对西方的崛起做出了积极和重要的贡献。因此，我们需要恢复东方经济活力以及东方在西方崛起过程中所发挥重要作用的历史。”<sup>[16]</sup> 近年来兴起的加州学派更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迫使学界从全球历史的角度出发，去重新审视欧洲的发展轨迹，并将这一地区的表现与欧亚大陆其他地区加以比较，并导致了如何为这种比较提供基础支撑的问题。对于工业革命起因的研究，也应当如此。

---

[14] 阿尔温·托夫勒：《第三次浪潮》，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第170页。

[15]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158页。

[16] 约翰·霍布森：《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第2、5页。

范赞登正是从以上两个方面入手，来重新探讨工业革命的起因。他在本书开始，就开宗明义地指出本书研究工业革命“深层次的”（或者说最根本）的起因，旨在说明：第一，在欧洲，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阶段是通向“腾飞”的工业革命的一条“漫长的跑道”。他指出，中世纪在许多方面都比1500—1800年间的三个世纪富有活力。这个观点解决了有关18世纪晚期工业革命起源的三种不同争论，即关于“大分流”（Great Divergence）的争论、人力资本形成在“革命”的准备阶段所起的作用的争论，以及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争论。第二，以往经济学家已经开始研究这一历史过程中的主要突破，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理论，以解释1800年左右发生的增长模式的激烈变革。但迄今为止，经济史学家们并未找到足够的证据来支持发生于1800年前几个世纪中的人口结构变化。但在本书中，作者认为，这样一种人口结构的变化确实发生了。第三，工业革命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出现了经济腾飞，而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分析和理解长期经济绩效是很有帮助的。经济史学家可以将此方法加以发展，用于研究工业革命。

基于以上认识，范赞登从新的角度对近代早期西欧的经济史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且把西欧与欧洲之外的地区进行详尽比较，思考这些地区的制度和人力资本形成所反映的内容，并尝试讨论它们在近代早期阶段的长期发展过程。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他采用了新近获得的数据，对长期发展进行量化分析。

本书另一大特点是走出欧洲，将西欧的发展置于世界历史视野之中，以观察西欧究竟是否真正与其他地区有所不同；如果确实不同，那么在何时才出现明显差异。作者认为要回答这些重要问题，首先要对制度效率、人力资本形成以及经济绩效的各种指标体系进行详尽的定量比较，以弄清制度与人力资本形成之间、以及人力资



本形成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作者认为：自中世纪晚期以来，西欧在制度、人力资本形成以及经济绩效三个方面都具有突出的表现，特别是北海地区（即英国和低地国家）在三方面的表现最为突出。然而，北海地区经济在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阶段所取得的成功，都深深根植于中世纪鼎盛时期形成的制度之中。

本书还有一大亮点，即知识经济的问题。作者认为：知识经济能够创造出足够的“实用性”知识，进而引发近代经济增长。但是，哪些长期过程和制度有助于人力资本的形成和思想的积累，以使西欧确实能够经历这种向知识经济，进而向近代经济增长的转变呢？过去的研究并不多。在本书中，作者长期地追溯这段历史过程，指出：从中世纪开始，特别是公元900—1300年，知识积累和人力资本形成出现了重要变化。在这段时期，欧洲发生了一场遍及全欧的经济扩张，但是到了中世纪晚期（1300—1600年），北海地区仍保持着快速发展的同时，其他地区却经历了经济增长减缓。他把这个现象称为欧洲经济的“小分流”（Little Divergence），并通过对婚姻模式、家庭对资本和劳动力市场的参与程度的研究，来解释这种“小分流”。在此基础上，他考察了1400—1800年间知识经济在西欧（特别是北海地区）的兴起。知识经济的发展推动了该地区独有的人力资本积累过程和知识积累过程，并构成了北海地区在1800年前的几个世纪中具有的强大经济表现的历史背景。随后，他将这段历史过程延续到了18世纪晚期西欧的“双革命”<sup>[17]</sup>，并继续对制度（如公民身份制度）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分析，以精确地确定近代经济增长始于何时，以及伴随着经济结构转变的人均收入持

---

[17] “双革命”（dual revolution）一词，系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在《革命的年代：1789—1848》一书中提出，指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和同时期发生的英国工业革命。这两场革命改变了世界，并且还在继续使整个世界发生变革。